

市场经济研究丛书

ShiChang JingJi YanJiu CongShu

市场经济 “现代体制”与“东亚模式”

刘力臻 著

商务印书馆



市场经济“现代体制” 与“东亚模式”

刘力臻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0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场经济“现代体制”与“东亚模式”/刘力臻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市场经济研究丛书)
ISBN 7-100-03059-5

I. 市… II. 刘… III. 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研究-东亚 IV. F131.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5947 号

SHICHANGJINGJÌ XIÀNDÀITǐZHÌ Yǔ
DōNGYÀMÓSHÌ

市场经济“现代体制”与“东亚模式”

刘力臻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中 国 科 学 院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3059-5 / F·381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1 1/4

定价: 18.00 元

前 言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自确立以来,创造了无以伦比的经济增长业绩,同时也经历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两种困扰和挫折。正是在这两种困扰和挫折中,市场经济的运行体制,完成了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古典”到“现代”的演进过程,即从单一的市场调节机制的“古典体制”到以市场调节机制为主的市场与政府二元调节机制并存的“现代体制”的演进过程。这种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化,或者说市场经济的“现代体制”是顺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对市场经济的“古典体制”、计划经济的高度集中体制、凯恩斯式的政府干预体制及西欧国家的福利体制扬弃的产物。当市场和政府二元调节机制达到优化组合时,市场经济“现代体制”就成为一种集效率化、公正化、有序化、弹性化、法治化和协调化于一体的经济体制。80年代以来,这种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几乎成为每个国家对经济体制的共同选择。由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具体国情、地域不同,其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环境、资源、地理位置不同,演绎出各种不同的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从而形成了市场经济“现代体制”全球化与发展模式多样化并存的大趋势。然而,市场经济“现代体制”的建立,只是为市场与政府二元调节机制的优化组合提供了体制上的保证,并不意味着市场与政府二元调节机制会自动实现优化组合。当二者由优化组合转化为二

者“双失灵”的组合时,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巨大的损害。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区域化、全球化、一体化及金融自由化、证券化、国际化的迅猛发展,市场经济的现代体制面临着新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挑战。在市场经济二元机制的现代体制下,如何使市场机制同政府干预机制在一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范围内实现优化组合,是每个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及世界经济整体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

20世纪后半期,世界经济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东亚经济的迅速崛起。曾经是极度贫困落后的东亚各国、各地区的人民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间,创造了从“日本崛起”、“四小龙腾飞”、“东盟诸国振兴”到“中国奇迹”等一系列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繁荣。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曾有人指出“东亚奇迹”不过是“一种神话”,“东亚诸‘虎’,只不过是‘纸老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似乎验证了这一说法,于是又有许多人在谈论“东亚奇迹”、“东亚模式”的破产,否认“东亚奇迹”的存在。事实上,“东亚奇迹”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作为客观反映和系统总结经济实践的经济学理论,不应因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否认“东亚奇迹”的存在,否认作为创造这一奇迹的载体——“东亚模式”的积极作用,而应对东亚经济奇迹在理论上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系统说明。

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专门以市场经济后发育国家及处于极端贫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1]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常常把经济体制因素作为外生变量,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下,研究和考察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资本积累、人力资源、工业化、财政货币政策、国际贸易、利用外资、技术进步等

诸多因素与经济成长的关系,忽略了经济体制本身对经济成长的阻碍和促进的作用,忽略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对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发展经济学家们曾经极其准确、客观地分析了市场经济后发育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几乎所有的矛盾、问题和先天不足。例如,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贫困的恶性循环”,^[2]“低层次均衡陷阱”,^[3]经济发展的“两个缺口”,^[4]贸易条件恶化及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所导致的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及发达的“中心国”对不发达的“外围国”的剥削等问题,也提出了重视资本积累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开发,提高储蓄率和投资活力,重视经济发展的计划化,推进工业化等具体措施。但他们没有揭示决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否的最本质的经济体制因素的作用。制度学派虽然把制度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并且对经济制度的变迁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无论是传统的制度学派还是新制度学派,无论是对经济结构的宏观制度的分析,还是对具体的产权制度的分析,无论是对现存制度的分析还是对演进制度的分析,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大多是以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及其演进与变迁为实证分析的对象,以他们自身所处的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很少以制度和体制分析的方法去探索发展中国家经济赶超和经济崛起的途径。^[5]上述情况说明,研究市场经济后发育国家经济增长理论的学者们,忽视了经济制度、体制的分析,而研究制度结构与制度变迁理论的学者们,则忽视了战后市场经济后发育国家的经济制度及体制创建与创新的分析。本书试图将经济制度分析特别是经济运行体制分析与东亚经济奇迹联系起来。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中,早期的正统经济学——古典学派把经济制度看做是一种静态的均衡。“这种模式,没有为完全竞

争的经济制度向垄断企业或垄断寡头经营的企业统治的经济制度的动态发展或演变敞开大门。”^[6]古典学派强调经济制度的局部的静态研究的重要性而不注重研究整个经济制度的演进。19世纪中期以来,历史学派、制度学派开始更多地强调经济制度的动态特征。经济学家们发现“现代经济同大多数人为的制度一样必须从动态上观察。一切面向市场的经济制度都必须从技术、资源、社会目标和期望都在不断变化的观点进行观察和评价,”^[7]从而同传统的经济分析的方法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制度学派并没有将这种对经济体制进行整体的动态分析拓展到发展中国家及市场经济后发育国家摆脱贫困与落后的研究上,本书试图将市场经济体制从“古典”到“现代”的动态分析同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联系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原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纷纷摆脱了殖民统治,成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经济实力各不相同,但它们原有的社会经济形态基本相似,经济上所显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烙印、封建经济关系的残余以及极度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都大致相同。每个国家都肩负着消除旧的生产关系、发展经济、赶超发达国家的重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三种经济体制的选择:一是以个人私有制为基础的传统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以国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三是以公司法人所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多元所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战后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发达国家处于工业化的发达阶段甚至是后工业化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及市场经济后发育国家该怎样实现经济赶超?是按部就班地建立

以个人私有制为基础的古典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直接建立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亦或是放弃市场经济体制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每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及市场经济后发育的国家都面临着这种自觉与不自觉的选择。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实践证明，经济体制的不同会造成巨大的发展差异。自由放任的古典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实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严重的两极分化、资源浪费、分配不公、劳资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等一系列的“市场失灵”的社会问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则使一些国家陷入了短缺经济的困境之中，呈现出体制僵化、缺少活力的“政府与计划失灵”的现象；市场经济“现代体制”是对上述两种体制的扬弃，是一种以市场制度为本，市场与政府两种调节机制并存的同国际市场相联接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结构为克服单一调节机制的缺陷奠定了制度基础。东亚各国、各地区正是以这种经济体制为载体，实现了二元机制的优化组合，才创造了摆脱贫困、实现经济赶超的辉煌业绩。本书试图将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同东亚经济的崛起联系起来，揭示东亚经济发展的最深层次上的制度、体制因素。

然而，东亚经济的增长又是令人困惑的。1997年夏，由泰铢贬值引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不仅使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发生逆转，出现了负增长，失业和贫穷也大大增加，而且波及全球股市、汇市，成为震撼世界经济的震源。东亚经济增长的戏剧性变化，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研讨，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教训、对策，学术界提出了众说纷纭的解释和主张。笔者认为，必须探索东亚金融危机的真实原因，因为找准了病根，才能对症下药，才不至于在给孩子洗澡时，连孩子带脏水一同泼出去。东亚金融危机的产生有

其具体的内在和外在的因素。从体制上说,东亚的失败是市场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的“市场失灵”及“政府失灵”的具体表现。是东亚国家、地区没能适应市场经济全球化、一体化,金融证券化、自由化、国际化发展的大趋势而出现的市场与政府二元调节机制由原来的优化组合转化为二者“双失灵”的劣势组合的结果。东亚的危机表明,“东亚模式”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调整转折时期。市场经济“现代体制”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东亚各国、地区的国民经济角度看,必须注重处理好三个经济关系,即货币经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及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关系;从东亚区域经济上看,市场和政府二元调节机制的并存及其优化组合不仅在一国范围内是必要的,在国际区域经济范围内乃至全球范围内都是必要的。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一体化、金融证券化、自由化、国际化的发展,各国经济的有序发展与全球经济宏观调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日益明显和深化。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呼唤世界经济宏观调控的全球化、一体化。一国范围内的市场经济的“现代体制”将向国际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扩展。

本书的研究方法总体上说是一种制度分析方法,但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制度分析,而是一种制度发展的层次划分、属种划分的系统分析方法和经济运行体制演进的纵横比较分析方法,即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采取制度、体制和机制的三种层次划分及市场经济制度属下的经济体制的种类划分的方法,重点研究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经济运行体制及决定其体制变化的内在机制的变革与创新,从中揭示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经济运行体制从“古典”到“现代”的演进规律;市场经济“现代体制”的目标模式、物质基础、面临

的挑战及市场经济“现代体制”下的“东亚模式”。本书在运用上述分析方法的同时,注重将辩证分析、实证分析和综合分析的研究方法配合使用,并试图通过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式加以表述。

第一篇 导论

第 1 章 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

在世界近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史中,曾经有过几次辉煌的经济增长的范例。首先是英国经济的崛起以及由此带动的西欧各国的经济增长。19 世纪后期以来,美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取代了英国经济的世界霸主地位。这一时期,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经济崛起引人注目。本世纪 20、30 年代,苏联经济的高速成长及非凡的业绩同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形成鲜明的对比,并逐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曾经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苏联经济的发展却没能保持应有的活力和繁荣,长期被短缺经济所困扰,直至最后消亡。整个 20 世纪,美国经济经历了“大衰退”和“滞胀”的考验,但却有不俗的表现,90 年代以来更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国际区域性的经济增长,最鲜明的实例是欧共体各国的发展和极度贫困落后的东亚地区的经济崛起。以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为开端,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探寻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探寻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探寻某一国家、某一区域、某一时期内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高于另一国家、另一区域、另一时期的根本原因。

1.1 经济增长的要素生产率决定论 ——从经济增长模型的构建到经济 增长要素的分析

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Harrod-Domar growth Model)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诞生,可以追溯到英国的 R.哈罗德爵士和美国的多马教授对建立平衡的(或‘指数的’)增长概念的重要贡献。”^[8]哈罗德以储蓄分析为起点,把有关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纳为三个变量:(1)储蓄率,以 S 表示, $S = S/Y$ (Y 代表国民收入);(2)资本—产出率(资本系数,投资系数),指资本(K)对产量(Q)的比例,以 K 表示, $K = K/Q$;(3)总产量(收入)的增长率,即经济增长率,以 G 表示, $G = \Delta Y/Y$ 。上述三个变量综合在一起的数学公式即哈罗德模型的基本公式: $G = S/K$ 。由于哈罗德模型有两个假定前提:一是消费倾向不变,从而储蓄率不变;二是生产技术不变,从而资本系数不变,即单位产量所需投入的资本量不变,所以哈罗德公式表明,要保证社会经济年复一年地均衡增长,三个变量必须保持这样的关系: $G = S/K$ 。其含义是,在 S 和 K 每年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要保证社会经济稳定增长,就要求每年按 G 的发展速度增长,设 S 为 15%, K 为 3,则要求产量每年增长 5%,这样所需投资在收入中占的比重为: $3 \times 5\% = 15\%$,恰好等于即定的储蓄率,即 5% 的增长率可以保证每年的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

多马从投资分析入手,分别以 I 和 ΔI 代表投资和投资增量;以 $\Delta I/I$ 代表经济增长率;以 δ 代表资本生产率(也就是资本—产

出比例的倒数)即 $\delta = 1/K$,从而得出多马模型: $\Delta I/I = \delta S$ 。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公式: $G = S/K = S\delta$ 。^[9]它的意义在于说明,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下去的必备条件是,一国的一定时期的储蓄应全部转化为投资,从而强调储蓄即资本积累、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资本积累增长模型 哈罗德—多马模型所阐述的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实质上说明了储蓄转化为资本积累、资本投资的重要性。没有资本积累就没有现代经济的增长。正如萨缪尔森在总结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时指出的:古典学派致力于研究稀缺的土地问题,“但是,自从 19 世纪初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史,是资本而不是土地居于支配地位的历史。”“在斯密—马尔萨斯模型中,劳动相对于土地而增长。在更为现代的模型中,却是资本相对于劳动而增长”。^[10]资本积累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那么,在假定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积累的长期趋势如何呢?资本积累增长模型最初的基本假定是资本(K)和劳动(L)共同进行生产,即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的投入。但是当出现“资本深化”即资本增长比劳动增长更快时,如果没有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因素,就会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资本利润的下降趋势。只有技术进步,技术发明才能提高资本生产率,进而阻止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发生。“在收益递减和技术进步之间展开的竞赛中,技术以数步之遥取得胜利。换句话说,至今为止,历史就是这样前进的。”^[11]因此,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把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结合起来说明经济增长的原因,结论是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存量增长率、劳动供给增长率,更取决于这些要素生产率所主要依赖的技术进步的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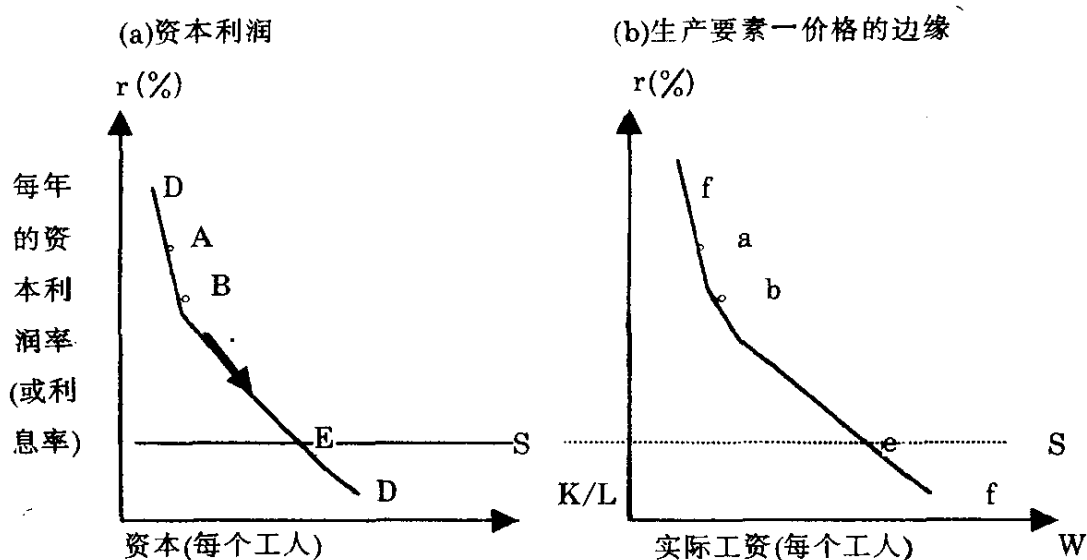


图 1-1 资本积累提高产量和工资,但压低资本的利润(或利息率)

注:(a)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以固定数量的劳动加上数量较多的资本品使资本收益递减。实际利息率会随资本的增加而下降,如 DD 曲线的箭头所示。资本积累迫使实际利息率(或资本利润率)从 A 降至 B ,再降至 E ,最后,利息率如此之低(在 SS 上),以至没有进一步的资本积累发生。(b)我们可以在右边的生产要素一价格的边缘图上看到工资变化的状况。资本积累在使资本利润下降的同时驱使工资上升。(以上图形引自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 12 版,高鸿业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325 页。)

索洛—斯旺增长模型^[12] 由于哈罗德—多马模型假定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固定不变,经济增长率必须与之相吻合的经济增长途径过于狭窄,三个变量的数值恰好满足充分就业均衡增长所需要的条件($G = S/K$)极其困难和偶然,^[13]美国经济学者索洛和英国经济学者斯旺于 1956 年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他们假定生产中使用劳动(L)和资本(K)两种要素, L 和 K 的配合比